

值得赞叹的白居易闲适生活方式

□ 冒建国



白居易的传世名篇《琵琶行》的序中有一句话：“予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觉有迁谪意。”意即“我从京城外放两年了，一直生活得舒心自在，听了她（琵琶女）的一番话后，这天晚上才体会到了被贬官削职的感受”。

白居易从朝廷的左赞善大夫（品级是五品上）被贬为江州郡的司马，从热闹的京城来到“地僻无音乐”的浔阳，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，按常理应该灰头土脸、垂头丧气或者恼怒气愤才对，怎么会若无其事、“恬然自安”呢？是什么原因让白居易想开了、想通了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

必须讲他被贬的缘由及被贬后的思想——

“中隐”之路

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面对日渐壮大，已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藩镇集团，是武力讨伐还是协商解决？朝廷上存在两种意见。宰相武元衡是主战派的代表。

6月的一天，武元衡正欲上朝，突然被割据势力派出的刺客当街刺杀。消息传来，白居易怒不可遏，急急上书皇帝要求缉拿凶手，追查幕后指使。主和派诘责他僭越职权，坏了规矩（当时白居易为左赞善大夫，不具备谏议的资格），加上对他之前写的那些讽喻诗《卖炭翁》《赠刘李二从军》等早就心怀不满，于是编造了一些理由，比如将他母亲的坟墓身身亡一事与他作《赏花》《新井》诗联系起来，认为他“甚伤名教”，将白居易逐出京城，打发到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。

刚到江州的时候，年已44岁的白居易甚为失落，倍觉孤寂，深感不适。现实如此，自己该怎么办？

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“出”（出仕）和“处”（退隐）的问题始终是士大夫必须面对并作出抉择的。“出”是出路，“处”是退路。出路没找对和退路没寻好，都会给自己平添若干烦恼，甚至带来不幸。经受住凡尘世俗金钱、权力、地位的诱惑，真正、彻底、永远地隐遁山林，仿佛桃花源中人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这是小隐。出仕为官，据其位尽其责，居庙堂之上勤勉政务，但又能够做到淡泊名利、轻视权力，对山水田园野趣之乐怀有向往之心，这是大隐。无论是小隐还是大隐，都是走极端。小隐难免生活困顿乃至穷苦；大隐难免失去个人自由，身累心

也累。于是，白居易想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“中隐”，那就是身心相离，身在仕途上，心却在山林里。这样亦仕亦隐、仕隐兼得，既能领取朝廷的俸禄，解除温饱之患，又能避开喧嚣与纷争，在山水歌吟、杯酒酬唱中，享受精神上的欢乐与闲适。

就这样，选择了“中隐”之路的白居易，一方面恪尽职守，毫不懈怠，颇有政绩。比如，他任杭州和苏州刺史时，均衡赋役，修筑堤坝，疏浚池塘，挖井开渠，兴建水利，解决了民众生活用水问题，灌溉了千顷良田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在为政之暇遍游名山大川，探访私家庭院，享受着闲适的个人生活。

调整心态

想通了，想开了的白居易，很快调整心态，将诗、酒、琴视为日常生活中逍遥自得、吟咏性情的“三友”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今日北窗下，自问何所为？欣然得三友，三友者谁？琴罢辄举酒，酒罢辄吟诗。三友递相引，循环无已时。一弹惬中心，一咏畅四肢。犹恐中有间，以醉弥缝之。……三友游甚熟，无日不相随。……”（《北窗三友》）“无日不相随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也于事有据。他又说：“身心安处为吾土，岂限长安与洛阳？水竹花前谋活计，琴诗酒里到家乡。”（《吾土》）在他的生活中，诗、酒、琴不可或缺，让他身心俱安。

白居易对诗情有独钟，写诗、吟诗可以说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如《诗解》：“新篇日日成，不是爱声名。旧句时时改，无妨悦性情。但令长守郡，不觅却归城。只拟江湖上，吟哦过一生。”《山中独吟》：“人各有一癖，我癖在章句。万缘皆已断，此病独未去。”写诗、吟诗成了诗人“独未去”的“病”，白居易对诗的痴迷热爱可见一斑。

以酒行乐

白居易终其一生都喜好饮酒。与他人常借酒消愁、借酒解忧不同，白居易饮酒更多的是以酒助兴、以酒

行乐，而且很多时候，酒与诗是同时出现的。如《不与老为期》：“行亦携诗篋，眠多枕酒厄。”《洛中偶作》：“遇物辄一咏，一咏倾一觞。”白居易晚年时曾仿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，写了一篇自传性的《醉吟先生传》，对自己的诗酒生活作了夸张描述：“……既而醉复醒，醒复吟，吟复饮，饮复醉：醉吟相仍，若循环然。由是得以梦身世，云富贵，幕席天地，瞬息百年，陶陶然，昏昏然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古所谓得全于酒者，故自号醉吟先生。”《卯时酒》是白居易借酒言志的一首诗。诗的后几段，他对“惶惶二十载”人仕生涯深为自责，认为只有“辞紫阙”“抛笔盖”离开庙堂，才能像“鱼返泉”“蝉离蛭”那样得到身心的自由与解放，最后诗人更是坦言：“五十年来心，未如今日泰。”

抚琴听曲

“伴老琴长在”（《闲卧寄刘同州》），弹琴、听曲也是白居易闲适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清幽悦耳的琴弦声中，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，情绪上的焦虑消解了，心态上的失落缓解了。诗人深有所感地说，抚琴听曲“既可畅情性，亦足傲光阴”（《食饱》），“一声来耳里，万事离心中。清畅堪销疾，恬和好养蒙”（《好听琴》）。晚年时，白居易仍对弹琴听曲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在《池上篇序》中追述道：“……援崔琴，弹姜《秋思》，颓然自适，不知其他。酒酣琴罢，又命乐童登中岛亭，合奏《霓裳》《散序》，声随风飘，或凝或散，悠扬于竹烟波已醉者久之。曲未竟，而乐天陶然已醉，睡于石上矣。”

从44岁被贬为江州司马到75岁病逝洛阳，被迫赠尚书右仆射，白居易历经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和宣宗六朝。他30年内没有遭到较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，人生较为顺遂，最后得以终其天年，这和他“中隐”处世调整心态，诗、酒、琴常伴身边，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显然有直接关系。

《八佾第三》之十九章(下)

□ 朱文津

兰若论语 讲堂

孔子针对鲁定公的问题，对症下药，开出了药方——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君有君之礼，臣有臣之礼，君臣皆须用礼来要求自己，克己复礼。张居正说：“为人君者，以尊临卑，易至于简慢忽略。若简慢忽略，便失了为君的道理。是以人君之于臣下，使之须要以礼。”在上位的人，老大当惯了，容易怠慢下属，不尊重人，所以必须以礼之药，治君之病。“为人臣者，以下事上，易至于欺罔隐蔽。若欺罔隐蔽，便失去了为臣的道理。是以人臣之于君上，事之须要以忠。”在下位的人，习惯受指派，容易怀私隐瞞，对上不忠，所以必须以礼之药，治臣之病。药虽各异，服法却同，皆是反求诸己，在自心上的用功。

这三家是儒家仁的内涵，礼的核心是仁。仁字，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二，合起来——二个人，或者人与人、所有的人。总之，人心相同，大家都是人，所以有同样的需求，自己想要的，别人也想要，自己不要的，别人也不要。我们想要孩子听话，那父母叮嘱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听进去？我们想要别人配合，那我们有没有去主动配合别人？所以我们考虑问题，不能只考虑自己，也要兼顾别人，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人生所有的好处从哪里来？儒释道三家，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厚德载物，好处皆从积德而来。你越是关心别人、体谅别人，越是能得到别人的回馈和帮助。而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，所有的好处，不是求来的，而是感得的，是自己积德所感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“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”“刘备三顾茅庐”这样两个故事。刘备一开始用的谋士是徐庶，化名单福，帮助刘备大破曹军，曹操得知徐庶真名，动用计谋以徐庶的笔迹，把他骗到曹营，因为徐庶被胁迫，所以进了曹营始终不献一谋一策。徐庶在行前，跟刘备推荐了卧龙、凤雏，二者得一可得江山，才有了后面的刘备三顾茅庐。刘备第一次去，诸葛亮不在；第二次去，诸葛亮访友去了，只见到了他的弟弟；第三次去，诸葛亮在睡觉，耐心等到他醒来才请教，所以感动了诸葛亮出山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期间张飞刘备这么辛苦，一次次隆重上门，太麻烦了，出了个馊主意——何不把诸葛亮绑来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把诸葛亮绑来了，他会不会献上《隆中对》，会不会在刘备死后，还尽心竭力地辅助刘后主？那很可能像徐庶一样，身在曹营一言不发，你也拿他没办法。

行善积德，完全是在自己，对境炼心，反求诸己。孔子最优秀的弟子颜渊问仁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克制自己的私欲，就可以回到礼的轨道。下手处是调控自己的身语意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看到一位老人跌倒了，想扶就是善，不想扶就不是善；别人挡住了自己的路，发嗔心就不是善；嘴巴忍住了，就是善，如果能够体谅别人、帮忙别人，就更是善。所以对到各种境界，把只顾自己、不顾别人的心念克制住了，转向理解别人、帮助别人，那就是克己复礼。这样的练习够了，内心调善了，就能够渐次向上，得到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的功德，最后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无论面对各种境界，都能合于礼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，向内之道，最后可以成圣，所以叫做内圣。在自心上用功，最后可以成圣成贤，何况是上好人际关系、得到功名利益这些小事了。

再说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到底靠什么来维系？靠法制，靠外在的约束，还是靠什么？从鲁定公的话

语中就看出一些差别，使、事，显出尊卑高下。但这种外在的形式能起到作用吗？常言道：“关门上锁，是防君子，不防小偷。”意思是说，这些外在的要求，对持守道德的君子来讲是有用的，而对不守道德的小偷来讲就形同虚设，不起作用。所以这些外在的形式只是提醒而已，并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。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仁爱之心、良知良能。《为政篇》第三章就告诉了这个道理，外在的政刑，只能民免而无耻；内在的德礼，才能有耻且格。那么人心到底靠什么凝聚？举个例子来说明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大小有二个指标，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人口。人口靠什么获得？《子路篇》告诉我们，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。”如果，一个国家的上位者能够好礼、好义、好信，就能赢得人民的尊敬、信服、用情，那么，这个国家，就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好地方，四方的民众就会赶紧背着孩子跑过来。我的老师说：“人气是怎么凝聚出来的？是从慈悲心里凝聚出来的。”至诚的心意才能感动人！慈悲的心意才能凝聚人！

那么，尊贵的社会地位又是从何而来？俗话说：“是金子必定会发光。”一个德才兼备的人，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、哪个单位不想要。《中庸》上说：舜大概是最孝敬的人了。德行上是圣人，地位上是尊贵的天子，财富上拥有整个天下，宗庙里祭祀他，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功业。大舜的起点不高，只是一个农夫，后来捕过鱼，做过陶器。家庭环境不理想，父亲娶了后妈，又生了弟弟象，三个人合伙要谋害他。但他是一个大孝子，所以无论走到哪里，他的德行总能影响到一方的人。历山耕种时，大家不争夺田界；雷泽打渔时，大家把好地方让给老年人；黄河之滨制陶时，大家从此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。他走到哪里，人们就跟到哪里，所以他住的地方，一年成集镇，二年成县城，三年成都市。尧帝听到了，就提拔任用他，并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最后把天子之位也禅让给他。“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”在大舜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。

创造和乐的环境，从哪里开始？人，生活在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伦关系中，无论哪一伦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，创造和乐的环境，就从自己开始做起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在上位，不陵下；在下位，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”处于上位，不欺侮在下位的人；处于下位，不攀援在上位的人。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。上不抱怨天，下不抱怨人。所以，君子安居现状来等待天命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。接着还说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君子为人处世就像射箭一样，射不中，不怪靶子不正，只怪自己箭术不行。同样，对到境界，如果不顺心、不合意，君子一定不会怪外境、怪别人，而是反躬自省，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只有累积了德行，成圣成贤，将来才会百发百中，彻底解决痛苦之因。

总结一下，人生在世，人与人之间总会发生问题，解决问题该怎么办？在外境上下手，还是在自心上下手，这是定公与孔子之间的差别，也是我们凡夫与圣人的差异。这里提到的是解决君臣关系、上下级之间关系应该采用的原则。其实，通用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。

一声长啸傲魏晋

□ 廖华玲

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，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原名其实是《啸傲江湖》，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传为“笑傲江湖”。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，不过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和历史功底，“啸傲”确实要有意境些，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。

“啸”是什么？一种歌吟方式，无切实的内容，不遵守既定的格式，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、一腔心曲，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直抒胸臆。说通俗点，“啸”相当于现代的“吹口哨”。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中，我们听到过“仰天长啸”；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我们听到过梁山好汉“啸聚山林”；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“竹林七贤”的砖画上，我们听到过阮籍的歌啸，用口哨吹出的旋律“与琴声相谐”。

阮籍，三国时期魏国诗人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其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，或许只有通过“歌啸”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。魏晋几朝更迭，然而乱世出俊才，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“魏晋风骨”的名片。那时的女人在唱“天无涯兮地无边，我心愁兮亦复然。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”；男人在弹琴饮酒赏菊吟诗，时不时飘然脱俗、孤傲轻狂的一声“长啸”。



啸兴盛于魏晋，不假，可啸却不是魏晋名士所首倡。其实，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多次写到“啸”，如“不我知，其啸也歌”“啸歌伤怀，念彼硕人”等。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，因而《诗经》中描写的啸者也多为女性，且心怀忧怨。妇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，或许只有古代的“窈窕淑女”能为之。不过，啸也不完全是用来承载

情感的，在某些施巫术的场合，嘹亮的“啸”声时常响起，解祸福、祈雨水。至东汉时，这种傲然自得的啸音逐渐进入了那些行为旷达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文人隐士的生活圈。到了魏晋，俯仰啸歌，简直是一种“啸”风行。

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政权走马灯一样更迭，文人名士的仕途难料，于是吟啸、讽啸或啸咏便出现在各种场合。大庭广众上放声长啸，若无旁

人般地“吹口哨”起哄，在现今看起来这怎么会是文人的表现？可回到魏晋的时代背景下，那却是他们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与政治诉求。其实，啸是表象，傲是本质，《世说新语》就用“傲然”来形容啸咏时的神情。而“啸傲”一词则更有意境，如：郭璞《游仙诗》所写的“啸傲遗世罗，纵情在独往”，陶渊明《饮酒诗》所吟的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。

对于魏晋时期的吟啸，是否可以把它理解成“长吁短叹”或“扼腕感慨”。如果是，它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，谈不上乐感，也和讲风骨、重风雅的魏晋名士的气质不相匹配。可实际并非如此，《世说新语》中有“善歌啸，闻者流涎”的记载，而阮籍的歌啸“与琴声相谐”，可见啸声是有旋律的、动听的、优美的。不过，啸声中没有歌词，这是由啸的发声特点决定的：重在吹，而不是唱。

唐代，文人吟啸的已经不多，但仍能听到一缕余音：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中有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李白的《游泰山》中有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。唐以后，吟啸之风渐息。

魏晋风度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，宽衣大袖飘逸着超然绝俗的哲学。一声长啸，傲然于魏晋，无不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感到震撼：啸傲魏晋。

关爱孩子的现在 就是关切祖国的未来

